

我自庄严——周叔弼其人其书

古籍馆善本组



周叔弼在扬州时的照片

周叔弼（1891-1984）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叔弼，以字行，晚年自号弼翁，原籍安徽建德（今东至）。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古籍文物收藏家。

周叔弼出身书香仕宦之家。祖父周馥（1837-1921）为晚清重臣，历任山东巡抚，两江、两广总督。曾任李鸿章幕僚，助其推行洋务运动，为北洋海军建设做出重要贡献。黎元洪、段祺瑞等皆以老师称之。政务之外，又有《易理参汇》、《治水述要》、《玉山文集》等著述。

四叔周学熙（1865-1947）为近代著名实业家，与南通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曾开办银行、纱厂、机器厂、煤矿公司等。父周学海（1856-1906）为周馥长子，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因家事艰难，经营

盐务。又潜心医学，曾著述及校刊、评注医书三十二种，并编为《周氏医学丛书》。周学海育有五子、七女。周暹排行第三，故字叔弼。

建德周氏家学渊源，故有读书著述之传统。周叔弼耳濡目染，自小爱好读书。五岁入私塾，课业之外，又专门延师学习英语，还曾短暂就读于新式学堂。

1908年，他在庐山、芜湖随侍祖父周馥数月，二人论学探理。《负暄闲语》即在此基础上写成。周馥主张“读书以研究道理、身体力行为要”，其薪俸所入则多作施与，此种务实和淡泊的思想对周叔弼影响颇深。

1909年，周叔弼父母亡故，兄妹皆依附叔伯散去。周叔弼暂居青岛期间，曾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合译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书信，编为《康德人心能力论》。



启新水泥厂照片

1914年，周叔弼移居天津，跟随四叔周学熙经营实业。周叔弼担任过唐山华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公司经理，还兼任

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等企业的董事，为发展民族工业做出突出贡献。1936年，日本吞并天津和唐山华新纱厂，他愤然离职。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又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1984年2月14日，周叔弢因病逝世，享年93岁。

周叔弢在商政两界历经沉浮，而楮墨芸香则自始至终伴随了他的一生。周叔弢藏书既重宋元旧槧、精抄精校、名家题跋之书，又不为传统所囿，注意收藏活字本、清代精刻本和敦煌遗书。其收藏还包括玺印、书画，



宋刻本《寒山子诗集》



周叔弢政协发言照片

及影印古籍和外文图书等。周叔弢精于目录版本之学，藏书以精严自励。他以“美人”喻书，以“五好”标准收书，力求版刻、纸墨、题识、印章、装潢俱佳。“自庄严堪”藏书既广且精，名重海内。周叔弢不仅藏书，且读书、校书、刻书。其手校群书，字体端谨；

撰写题跋，多有卓见；影印善本，纸墨精良。

受家庭熏陶，周叔弢16岁即开始依据张之洞《书目答问》，购买一些学习所需的实用书籍。之后因读晚清目录版本学家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眼界开阔，开始收藏古籍、研究版本。

1917年11月，周叔弢收得清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宋本《寒山子诗集》。这是他收藏的第一部宋本书籍，并因而将藏书斋命名为“拾寒堂”，后又名曰“寒在堂”。

周叔弢自谓海源阁藏书是他平生收书最精的部分，共收得海源阁旧藏55种，数量、质量均为海内屈指。

海源阁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得清毛氏汲古阁、钱曾、季振宜、徐乾学等名家藏书之精华。1927年，海源阁后人杨敬夫将大批善本运至天津，或抵押或出售以作经商之资，其书之流散一时为公私藏家所瞩目。

周叔弢也关注着海源阁藏书的命运，往往不惜重金购藏。他收得的第一部海源阁旧藏是宋本《南华真经》。之后，周叔弢结识了杨敬夫，直接从他手中购得的第一部书为宋本《新序》。

周叔弢还注重收藏名家抄校题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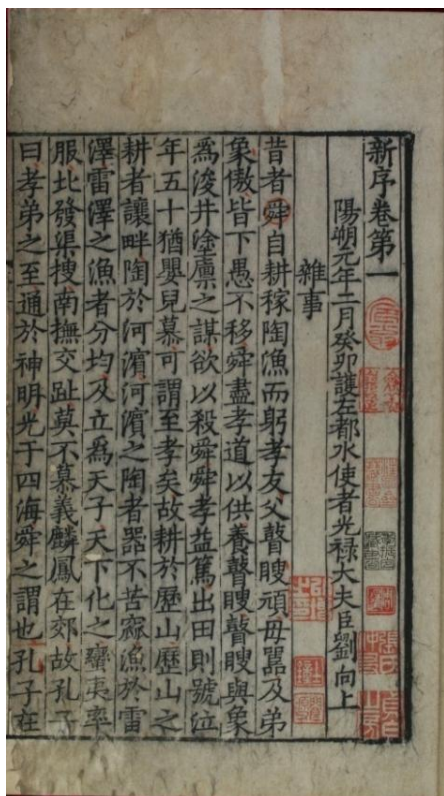
1933 年，韩应陞“读有用书斋”藏书散出。周叔弢以七千金从文禄堂收得韩氏旧藏抄校本三十余种，自称是从来未有之豪举。此后，他又收得多部韩氏旧藏珍品，如明姚咨抄本《经鉅堂杂志》、清初抄本《滏水文集》等。

周叔弢藏书中有吴宽、钱穀、冯舒、叶奕、穴研斋、澹生堂、毛氏汲古阁、鲍氏知不足斋等众多名家抄本，皆可称道。世人奉为拱璧的“顾校黄跋”书，周叔弢收藏约 70 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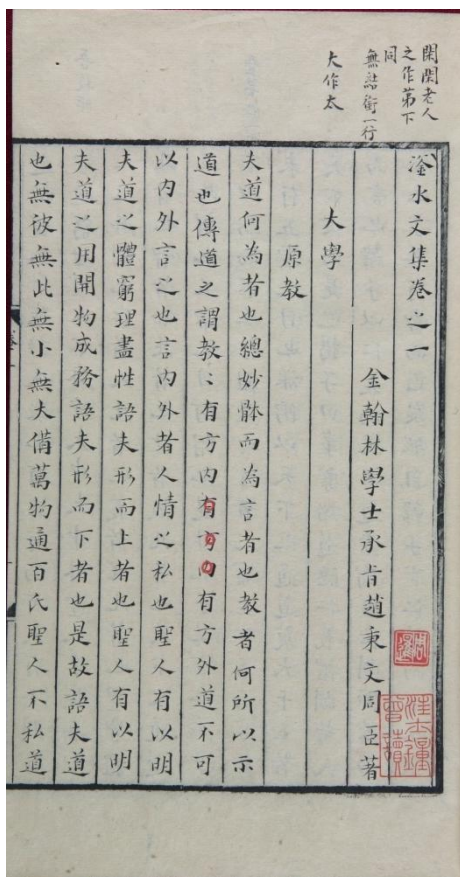
周叔弢曾叹好书不可遇，如遇铭心绝品、孤本秘笈，不惜倾囊以求。1936 年至 1945 年间，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赋闲在家，变卖产业度日。然遇好书，仍摩挲难舍，往往举债购书。此种苦心收书之举，屡见于周叔弢的收书记录中：

1936 年，周叔弢在《丙子新收书目》卷首题记云：“负债巨万，尚有力收书耶？姑立此簿，已迟往昔半月之期矣。”

除夕又记：“今年财力不足以收书，然仍费五千七百多元，结习之深，真不易解除也。所收书中亦自有可喜者，但给值稍昂耳。”



宋刻本《新序》



清初抄本《滏水文集》

1939年元旦，周叔弢在《己卯新收书目》卷首题：“今年书运或可转亨耶！当视财之丰啬为进退耳。”

年末附言曰：“今年本无力收书，乃春初遇陆鉴《毛诗》，岁暮遇《衍约说》、《蜕庵集》，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十二月二十日老弢记于自庄严堪。是日启乾孙周岁，家人聚饮，亦乱世一乐也。”

周叔弢积数十年藏书之经验，提出古籍善本的五好标准：

第一，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

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

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

第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

第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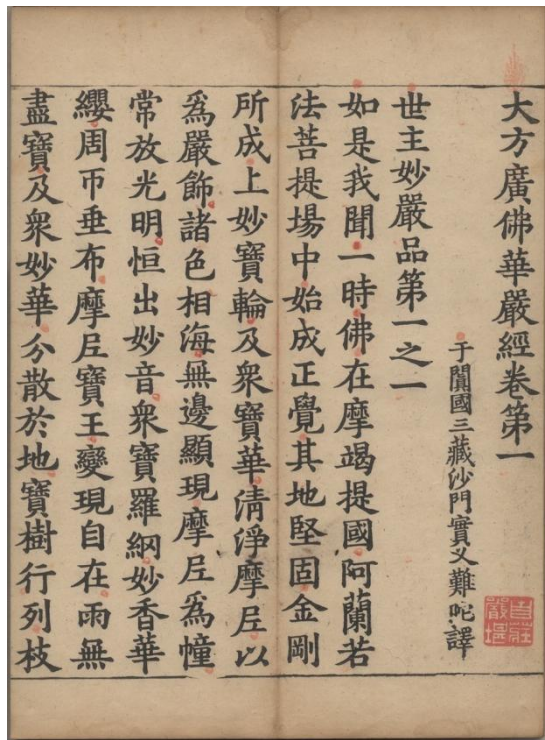
五好的比喻，既有理论，又格外形象生动，为学界所提倡。

周叔弢所收之书必符合其中一条或几条。如宋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字体版刻好；明本《重刊嘉祐集》有顾广圻校跋，题跋好；

《中吴纪闻》为明末毛氏汲古阁初刻，印刷好；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孝经》收藏印章好。而宋本《新定三礼图》、《新序》、《陶靖节先生诗》等书则五好兼有。

“五好”以人喻书，周叔弢对于书的爱护，也如同对人一样，饱含着尊重和感情。无论是自己读书还是他人借观，均需恪守赵

孟頫之读书六勿：“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



宋杭州朱绍安等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周叔弢注重保存旧装，如黄氏原函、毛氏原装等。遇书有残破，则请良工补缀、重装，用樟木夹板、楠木书匣装起，再摆进樟木或楠木书箱里保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才“对得起”好书。

收得好书，周叔弢便请名家治印留念，如“寒在堂”、“半雨楼”、“双南华馆”、“东稼草堂”、“孝经一卷人家”等。

出于爱护书籍的考虑，周叔弢对于印章的使用十分慎重。早年他曾使用长方阳文印章“曾在周叔弢处”，后觉此印过大，1926

年开始改用“周暹”两字小印，钤于善本，以免有损书之品貌。

周叔弢使用印泥也很审慎，数十年来他一直使用二十几岁购于上海西泠印社的上好印泥。唯恐印泥质量不好，印油散去，影响书的品质和寿命。

1942年（壬午）初，因家用不足，周叔弢忍痛售卖明版书一百数十种，易款度日。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舍，特作书目《壬午鬻书记》纪念。

不久，周叔弢闻说宋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在天津求售，见此书刻印精美，周叔弢恐失之交臂，竟用易书之资买下此书，自谓：“卖书买书，其情可悯。幸《礼记》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计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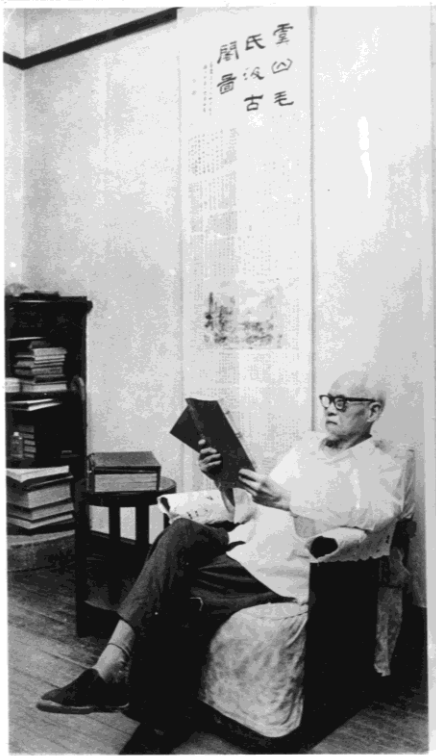
周叔弢对所鬻之书难以忘怀，其后又购回明刻本《齐乘》等，并谓“赎书一乐，故友重逢，其情弥亲也”。

周叔弢不仅仅精于收藏，更版本目录之学颇有研究，多藏异本，手校书籍数十种，皆校订精审。周叔弢主张校讎当本古为今用之旨，校本应选择通行易得者。这一观点记载在他所校的《唐贾浪仙长江集》跋文中。

周叔弢校书用好墨、书端楷，校语常先

写于夹条上，再行过录，从不随意涂抹。故傅增湘在《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中评价说：

“皆字画端谨，朱墨鲜妍，颇具义门风格。”



周叔弢在书房照片

周翁藏书题跋，或考证版本，或载录传承，或记录心情，能反映藏书家的学识与雅趣。周叔弢藏书重视名家校跋，自己也偶作题跋。今已辑出的弢翁题跋计有百余则。所撰题识颇有黄丕烈的风格，从中不但可知其鉴别之精，而且能见出他收书之苦心 and 爱书之挚情。访得好书时的“惊喜过望”，失书之时“心意彷徨”，捐书之时的“书得其所”，种种心情，跃然纸上。周叔弢

作题跋识语不轻易落笔，多用小字楷书或行楷书写。他的一些题识，还请精于小楷的劳健誊录。

传统藏书家贵古而贱近，周叔弢于宋元本收藏之外，不为前人观念所囿，关注活字本和清刻本的收藏。周叔弢收得泥、铜、木活字本四百余种。其中著名的有《鹑冠子解》、《开元天宝遗事》、《春秋繁露》等。1961年之后，他开始收集清代活字本，意在保存现代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前的活字印刷书籍。

周叔弢重视清代版刻精品，如名家手写上板的软体字本、清代影宋本、套印本等。

他所收清康熙五十三至五十四年（1714—1715）项綱群玉书堂刻本《山海经》，写刻精好，纸墨莹洁。《古文渊鉴》为清康熙内府刻四色套印本，十分珍贵。

此外，周叔弢对纸张的研究亦有浓厚兴趣，九十二岁高龄时还写下关于开化纸的题记，并有“取清内府印本”以研考的想法。

更为难得的是，周叔弢藏书除自己赏鉴研究外，更有为国家保存文物的深意。敦煌遗书流散后，他极力访求，共购藏敦煌遗书256卷，其中十余卷有北齐、隋、唐和五代的年号，颇为珍贵。1941年，他收得近十种钤有李盛铎印章的敦煌遗书，研究后他认出是双钩伪造。他又专请赵万里鉴定，两人研究后认定为后人作伪。为不使假物流传骗人，遂毫不犹豫，付之一炬。1981年，他将收藏的敦煌遗书全部捐献天津艺术博物馆。

周叔弢的另一类收藏是古印玺，共收得战国、秦、汉古印玺及历代官印、私印九百余方，其中的王兵戎器铜玺、魏晋曹氏六面铜印皆为古印玺之珍品。他还收集元、明、清名人书画以及旧墨等文物，颇可见其好尚。

周叔弢藏书却不独善其身，非常注重古籍的保护与利用。他提倡以影印方式将稀见古籍广泛复制，以广流传。他曾用木版雕刻或珂罗版印刷等方式复制十几种善本书籍，并力求纸好印精，如宋书棚本《鱼玄机诗》、宋本《寒山子诗集》、元相台岳氏本《孝经》、

朝鲜刻本《庐山复教集》等。其中一些印本用开化纸、高丽纸、皮纸刷印，颇为精美。

《孝经》中所钤乾隆御玺等收藏印均用红色套印，以保存原样。

周叔弢也留心收集善本“书影”。将多部善本书各影印一两页汇集成书，以方便对比、研究和观赏。他藏有《铁琴铜剑楼书影》、《留真谱》，以及日本书陵部图书寮、静嘉堂等机构藏书的书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叔弢就与徐森玉、赵万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影印善本古籍。后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拟出版《古逸丛书三编》，周叔弢提出选目意见，并推荐自己旧藏善本中的铭心绝品12种，其中有宋本《兰亭续考》、《南华真经》，元本《梅花百咏》、《梅花字字香》，明铜活字本《开元天宝遗事》等。该书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59年，周叔弢还与徐森玉在全国人大联名提案，呼吁设立古籍装修技术班，培养古籍修复人才。提案通过后，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各举办一期，每期两年。

周叔弢晚年尤其注重传统雕版技艺的传承。1974年，他见上海书画社（朵云轩）依元大德广信书院《稼轩长短句》影刻本秀丽精美，不禁惊喜，赞其上继康熙时扬州诗局遗风。并写信给顾廷龙，详细询问书手、刻工的姓名，记在书上，以示表彰。

周叔弢又曾为图书馆工作者讲授版本知识，帮助他们鉴别古籍。他对古籍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一般藏书家的影响。

周叔弢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亲自聘请学者为子女的老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仪，并亲自为子女学习选定课本。哲嗣周



周叔弢指导讨论照片

景良回忆幼年时期读书，曾使用周叔弢自己影印的善本，获益匪浅。周叔弢教育子女要学有专长，也鼓励培养个人兴趣和爱好。

周叔弢不仅传授子女学习知识和爱书、用书的方法，更向子女传授做人的原则。子女上学或成家，他都会赠送古籍作为纪念。周叔弢晚年将所有藏书捐献国家，其子女亦纷纷效仿。周叔弢次子周珏良去世后，他的夫人方缙女士和孩子，特别将家里收藏的宋版书无偿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她说：书是叔弢先生的原物，他没有把书作为私有物，我们更不能将这些书永远收留在自己家里，希望这些古籍善本最终能够在国图团圆。

在周叔弢先生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子女都学有专长，成为各自行业的专家。

周叔弢藏书既精且广，但并未囿于以往“子孙永保”的藏书理念。1942年，周叔弢

在《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上写道：“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

耳。”

然而，古书流传难免散佚，宋元佳槧也时有配补。周叔弢曾用十七年配齐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以成延津之合，尤可称道。此书原为徐坊旧藏，后流入书肆。1930年，周叔弢于文友堂收得《春秋名号归一图》及《年表》，继于藻玉堂得六卷；1931年，于肄文堂得二十三卷，至此全书已得二十九卷，仅缺卷一。1944年此本卷一复现于世，经两年辗转协商，周叔弢最终以黄金一两购得，欣喜之情见于跋文：“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

近世以来，大量中国古籍流散域外。海源阁旧藏部分珍籍被书估售予日本人经营的满铁大连图书馆。周叔弢十分痛心，感慨说：“若能举债并《说苑》、《荀子》、《管

子》、《淮南子》同收之，岂不大妙乎。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

1933年周叔弢见日本《文求堂书目》，其中著录宋、元、明本百余种。周叔弢“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乃以日金一千元将宋本《东观余论》购回。又陆续从文求堂赎回元本《黄山谷诗注》、汲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而《通典》一时筹款不及而被日本定为“国宝”不得出境，多年后周叔弢仍遗憾不已。

当代藏书家黄裳为此赞叹道：“其意甚壮，其情可哀。爱书与爱国，同是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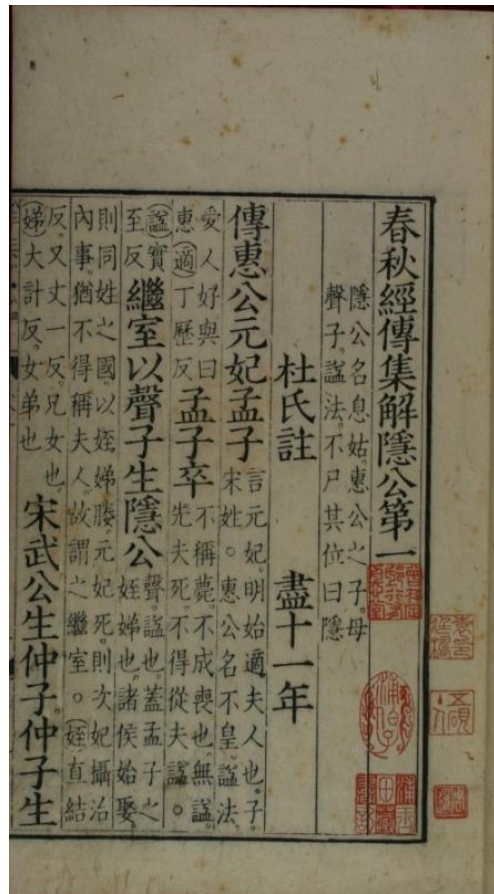
1947年，周叔弢得知自己收藏的宋本《群经音辨》中卷及宋抚州本《春秋经传集解》卷一至二正为故宫所缺，即捐出所藏，以成完帙，并说：“故宫所佚，得此即为完书，予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耶！”1949年7月，又特意从书肆购得宋本《经典释文》第七卷捐赠故宫，配成完书。20世纪50年代，故宫部分藏书拨交北京图书馆，此三种皆在其中。

1951年，北京图书馆举办《永乐大典》展览。周叔弢参观之后将旧藏的一册捐献国家，认为：“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

正是因为将书视为“天下公物”，以书之聚合为“不负此书”，才有书成完帙之举，进而又有百川归海之意愿。

1950年，周叔弢开始整理藏书，遴选核对，准备捐赠。他说：“我将心爱的藏书贡

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遭受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吗？”



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1952年8月，周叔弢将历年收藏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校古籍中最为精善的715种2672册无偿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赞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周叔弢曾对次子周珏良说：捐书之时何尝没有不舍之意，也曾打算留一两部自己玩赏，但想既然捐书，贵在彻底，留一两部又如何挑选？所以决心悉数捐出，一本不留。

1952年后，周叔弢又陆续将自己的收藏无偿捐献。其中几批大宗的捐赠为：

1954 年，向南开大学捐赠中外文图书、小册子共计 3500 多册。

1955 年，向天津市人民图书馆（今天津图书馆）捐赠清代刻本 3100 多种 22000 余册。

1972 年，向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捐赠活字本 700 多种、印谱 130 多种以及自己常用的通行本，共计 1800 余种 8500 多册。

1981 年，向天津市人民政府捐赠敦煌遗书 256 卷、字画 38 件、古玺印 910 方，及旧墨等文物共计 1260 多件（今藏天津博物馆）。

周叔弢将毕生收藏全部捐出，极大地充实了公藏机构的馆藏。

周叔弢无私奉献的精神亦为其家人所承继，数次向公共图书馆无偿捐赠善本古籍，可谓善继弢翁之志。

长子周一良曾于 50 年代后多次捐赠古籍善本，包括朝鲜写本《东国岁时记》。

次子周珏良逝世后，夫人方缙将宋大字本《东汉会要》零本 1 册及《后村居士集》等 9 种善本捐赠北京图书馆。又将毛氏汲古阁刻本《法书要录》、劳健仿唐人写经《阿弥陀经》等 66 种 110 册捐赠天津图书馆。

周景良曾奉左道映老夫人之命将明正德本《陈思王集》捐赠北京图书馆。又将弢翁校跋清刻本 3 种、弢翁所用的《康熙字典》、玻璃版片、书箱等捐赠天津图书馆。